

中大管理研究

China Management Studies

2012年 第7卷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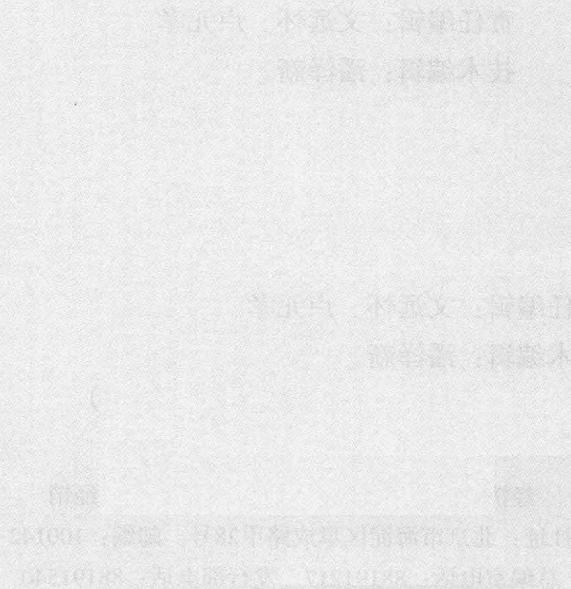


经济科学出版社

中大管理研究

China Management Studies

第7卷 (2)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2年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大管理研究. 2012年第7卷. 2/李新春主编.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2.7

ISBN 978-7-5141-2017-2

I .①中... II . ①李... III . ①企业管理—文集 IV . ①F27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127591号

责任编辑：文远怀 卢元孝

技术编辑：潘泽新

中大管理研究 (2012年第7卷-2)

李新春 主编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28号 邮编：100142

总编室电话：88191217 发行部电话：88191540

网址：www.esp.com.cn

电子邮件：esp@esp.com.cn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787 × 1092 16 开 11 印张 147 000 字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141-2017-2 定价 20.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中大管理研究》学术委员会

(按姓氏拼音字母排序)

陈工孟	上海交通大学
陈信元	上海财经大学
Michael Firth	香港岭南大学
黄俊英	高雄 中山大学
贾建民	香港中文大学
李维安	南开大学
刘常勇	高雄 中山大学
陆正飞	北京大学
毛蕴诗	广州 中山大学
钱共鸣	香港中文大学
Joachim Schwalbach	柏林洪堡大学
王重鸣	浙江大学
汪寿阳	中国科学院
吴世农	厦门大学
张 华	香港中文大学
赵曙明	南京大学



CSSCI (2012-2013) 收录集刊

中大管理研究

2012年 第7卷 (2)

主 编 李新春

特 邀 主 编 梁 琦

副 主 编 (按姓氏拼音字母排序)

辛 宇 张书军

目 录

特稿

- 1 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的国际环境与因应战略
张宇燕
-
- 13 亚洲新兴市场企业“加速的国际化”现象剖析
柴忠东 孙 卓
- 35 外商直接投资、联系效应与本土企业技术进步
——基于江苏省制造业数据的分析
安礼伟 马野青 李崟鹏
- 47 人民币升值与中美贸易——基于引力模型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田 翩 余森杰
- 66 利用高频数据管理沪深300指数的尾部风险
——基于Realized GARCH模型的VaR
黄 震 王天一 黄 卓
- 87 公司创业投资研究的前沿探析与未来展望
李新春 林子尧
- 106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空间与产业二重协同：研究述评与展望
陆剑宝 梁 琦
- 120 从工作中解脱出来？心理解脱在工作/家庭界面中的作用
龚 会 王永丽 卢嘉辉
- 140 商业模式构成要素间的匹配性对企业绩效影响研究
——以创业板及中小板企业为例
张晓玲 李 东 赵 毅

CONTENTS

Special Article

- 1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China Faces and Its Response Strategies after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Zhang Yuyan
-

- 13 An Analysis of FDI by the Emerging Market Economies
Chai Zhongdong Sun Zhuo
- 35 FDI, Linkage Effect and Local Firm's Technical Progress: An Analysis Based on the Data of Manufacturing Sectors of Jiangsu Province
An Liwei Ma Yeqing Li Yinpeng
- 47 RMB Revaluation and Sino-US Trade: Theory and Evidence
Tian Wei Yu Miaojie
- 66 Managing HS 300 Index Tail Risk with High Frequency Data: Value-at-risk Based on Realized GARCH Approach
Huang Wen Wang Tianyi Huang Zhuo
- 87 Frontier Analysis and Future Prospect of Study on Corporate Venture Capital
Li Xinchun Lin Zirao
- 106 The Space and Industry Synergistic Effects of Producer Services and Manufacturing: Literature Review and Prospect
Lu Jianbao Liang Qi
- 120 Detachment from Work: The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Detachment at Work/Family Border
Gong Hui Wang Yongli Lu JiaHui
- 140 A Study of the Impact of Fit among Business Model Elements on Firm Performance: Based on the Listed Firms in GEM and SME Boards
Zhang Xiaoling Li Dong Zhao Yi

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的国际环境 与因应战略

张宇燕^①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出现这种变化的直接原因，在于中国综合实力的迅速绝对与相对地提升之后，中国对今天和未来世界变得必不可少，在于中国未来的健康稳定发展在相当程度上与外部环境密切相关。在此背景下，对当今和未来国际经济和世界格局进行宏观上的分析与判断，将有助于对中国未来 5~10 年的国际战略进行深入思考。

本报告包含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对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发展出现的新变化、新趋势进行归纳和做出总体判断；第二部分将分析“十二五”时期中国发展面临的重要机遇和挑战；第三部分提出对策建议及中国在新时期的战略构想。

一、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发展 出现的新变化与新趋势

近年来，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中均暴露出不少新问题，出现了诸多新变化、新趋势。本次金融危机加快和强化了这些变化趋势的速度、深度和广度。

(一) 世界多级化趋势日趋明显

^① 张宇燕，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本文原是一篇内部报告。

当今世界格局力量对比变化中最突出的特点，美国霸权从它的顶峰平台期开始步入缓坡下降期，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既得利益集团因整体相对实力下降而开始失去国际体系的绝对主导权，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经济体整体实力上升并正式且全面地走上全球舞台。本次全球金融危机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出现复苏迹象，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作用突出。世界多极化趋势日趋明显主要体现在 G20 国际协调机制的创立和在全球事务中扮演关键作用上。由 G20 取代 G7，尤其是中国和印度、巴西、南非等发展中国家进入 G20，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在 G20 内部各种国际组合的出现，如 G2(中美)、G3(中日德债权国集团)、G4(中美欧日)、金砖四国及“基础四国”(中印巴南)，一方面显示出多极化进程在加速，另一方面也显示出由发达国家组成的既得利益国家集团内部开始分化。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不断提升，从另一个侧面展示出世界多极化趋势得到加强。欧盟《里斯本条约》的通过，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正式创立，便是两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

(二) 中华民族复兴进程开始对世界格局形成一定冲击

中国对现行的国际格局或国际秩序的冲击，首先是物质层面的冲击。所谓器物层面，主要是指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经济规模急剧扩大，科技进步步伐加快，军事预算的增加和装备的现代化，对外部能源与资源的需求大幅度增加，与教育和工业化进程密切相关的人力资本的快速积累，以及“负外部力量”(如二氧化碳排放)。其次是货币层面的冲击。当今的世界货币是美元和欧元，人民币的国际使用量和覆盖面很小。作为提升中国货币金融影响力的主要措施，就是已经起步的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无论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还是人民币国际化，都势必威胁到现行制度的既得利益者的利益。第三是制度层面的冲击。尽管短期内实现改革具有相当大的难度，但综合国力与国际规则制订权或发言权不相称的中国，需要寻求更为公正的国际规则，即更能体现中国和发展中国家利益诉求的国际规则。最后是观念层面的冲击。改革开放 30 年来，我们走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次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特别是世人目睹了中国的经济绩效以后，中国的发展模式及其蕴含的价值理念，已开始成为主导当今世界的自由资本主义思潮的强有力竞争者，并构成中国“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 经济全球化进程波折不断但总体趋势不会逆转

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各国经济出现不同程度下滑。出于国内政治需要，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开始抬头，置国际规则于不顾的现象时有发生。

WTO 和世界银行的统计显示，近两年全球提起贸易救济措施的案件总数同比大幅增加。与此同时，国际资本流动在 2007 年达到历史高峰后也开始大幅度下滑。经验表明，在经济危机以及开始出现复苏迹象期间，贸易保护主义通常会进入高发期，并伴随着 FDI 减少，从而使经济全球化进程遭遇波折。

尽管当前全球保护主义甚嚣尘上，资本流动今非昔比，但各国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度已经如此之高，以至于任何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都将损人害己。虽然存在缺陷，WTO 等国际机制和相关规则对于防范和约束保护主义也能起到一定作用。考虑到当今世界经济复苏正处于极其脆弱时期，尤其是考虑到众多全球问题日益凸显且必须通过有效的全球治理加以解决等事实，总体上看，全球化大趋势不会改变。

(四) 全球大分工格局不可持续性显露但全面调整尚需时日

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全球存在着一个“大分工”，即中国、日本和亚洲其他国家生产工业制成品，俄罗斯、沙特和南非等国生产资源与石油，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提供金融产品。建立在这种大分工格局基础上的贸易格局，表现为美国等国用金融产品换取中国等国的工业制成品和俄罗斯等国的资源与能源。1980 年代中期、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美国连年巨额经常项目赤字必须依靠更多的资本项目盈余来平衡。换言之，美国必须输出同等数量的“广义金融产品”才能平衡其国际收支，才能把这一分工－贸易格局的大游戏接着玩下去。广义金融产品在此主要包括联邦政府债券、各机构债券和股票以及与之相关的一大批金融衍生产品，再加上美元纸币。和实物产品与服务类似，金融产品也需要“创造”，而“创造”的重要途径之一就在于金融创新。“次贷”便是众多金融创新的一个品种。次贷危机反映出了这一大分工的可持续性出了问题。“再平衡”也好，嫁祸于人也罢，美国的全部努力其实都指向同一个目标：使“大分工”局面得以稳定持久地延续下去。毕竟，“大分工”是目前为止所能想到的使美国受益最大的分工－贸易格局。鉴于在“十二五”期间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根本性转变的可能性不大，故更可能出现的局面还是“大分工”经过某种调整后的复归。

(五) 经济危机孕育新兴产业成长和发展的机会

科技创新在引领经济走出危机、进入周期性长期增长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历史经验表明，每次大的危机后，通常会伴随一场新的技术革命。本次国际金融危机使各国开始对处于失衡状态、过度依赖金融部门的全球经济

济发展模式进行反思。世界经济复苏需要寻求新的产业增长点，现有产业结构本身也有待调整和升级。主要发达经济体和部分发展中经济体正着力进行新技术开发，并希望能够在新一轮技术创新和产业竞争中占据制高点。这一过程必将促成新技术的变革和一批新兴产业的崛起。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可持续发展目标要求全球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做出调整。尽管存在较大争议，但是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与节能、减排、环保等密切相关的科技创新和相关标准的确立，将成为今后几年世界关注的重要议题。在此背景下，以低碳经济与新能源等为主的绿色产业，以及为节能、环保需求应运而生的新材料等新兴产业将蓬勃发展。

（六）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开始孕育改革但总体格局不会根本改变

爆发于 2008 年秋天的全球金融危机，凸现出货币金融领域现有国际体系的两个重大缺陷：一是美元本位制下缺乏对国际储备货币发行的约束；二是以 IMF 为代表的国际金融机构难以承担起稳定全球金融体系的重担；三是国际金融监管尤其是对主要发达国家的金融监管严重缺位。因此，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改革已成为当前以及未来几年国际谈判的主要议题之一。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改革将围绕着全球储备货币体系、国际金融机构决策机制、全球金融监管以及汇率机制等问题展开，基本改革方向是使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多元化（其中特别提款权具有成长为超主权储备货币的特征与潜力），让 IMF 等国际金融机构的决策程序更加具有代表性，加强金融监管尤其是对所谓“影子银行”的监管。尽管本次金融危机削弱了美元霸权，提升了特别提款权与欧元的相对地位，促进了亚洲货币合作，但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由美国与美元主导、欧洲与欧元协同的局面，在未来数年内不会得到根本改变。此外，随着人民币区域化程度的提高，是否创立亚洲单一货币将成为亚洲国家必须共同做出的选择。

（七）全球问题凸显引发国际规则的普遍适用性提高

除了稳定、公正的国际贸易与货币金融体系之外，影响整个人类福祉且日益严重的全球问题至少还包括：（1）气候变化，这也是眼下议论甚多、争议颇大的问题；（2）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问题；（3）和人类健康密切相关的传染病问题，其中既包括眼下正在流行的 H1N1 流感，也包括艾滋病，还包括未来可能出现的各种致命传染病；（4）生物多样性和与之相联的物种灭绝问题；（5）与战争与和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问题。全球问题的解决途径为全球治理，具体表现为国际规

则的普遍适用性提高。

国际规则的普遍适用提高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1）是参与国际规则的经济体以及人口越来越多；（2）是国际规则所涉及的范围或内容越来越广；（3）是国际规则的约束力有越来越强的趋势；（4）是世界各国的实力与利益同国际规则的联系越发紧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国际规则是非中性的，也就是说，同一规则对不同经济体或人群的福利影响是不同的。换言之，在许多场合是规则决定竞争的胜负。因此，一个国家在全球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主导国际规则的制订、解释和执行。在一个国际规则普遍适用性不断提高的世界中，各国或国家集团之间的竞争在相当程度上就表现为对规则制订权的争夺。

二、“十二五”时期我国将面对的主要外部挑战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到，当今世界正处在较为迅速的变化之中。这些新变化以及未来走势，将构成中国发展的积极或消极的外部条件。总体上看，在“十二五”时期，我国发展的面对的外部机遇表现在以下七个方面。首先，多极化趋势为更加公正合理地调整国际秩序开辟了新空间；其次，全球秩序或国际格局的变化的渐进性而非突变性符合我国和平发展的战略诉求；第三，经济全球化趋势总体上不可逆转为我国参与全球分工并分享收益提供了保障；第四，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提升使得我们具备了改善或营造自身外部环境的能力；第五，发达国家内部积重难返且日益严重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它们抑制我国发展的力度；第六，本轮全球经济危机可能催生的科技革命将为拉近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提供可能；最后，中国在经济危机中的杰出表现及其所代表的发展模式增进了自身的软实力。

机遇永远和挑战并存。在“十二五”期间我国还将面临许多外部挑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仍将中国视为“异己”势力，其分化、西化、制度化和妖魔化中国的战略意图不会改变，同时，我国在能源资源、金融、市场和国际分工等领域仍存在风险。

（一）西方分化中国的图谋和周边不稳定因素威胁我国传统安全

西方国家分化中国，即通过领土分裂来弱化中国的战略图谋在未来几年仍将继续，因此我国家主权及领土安全方面仍存在隐忧。尽管不足以构成直接威胁，但由于美国介入，台湾问题仍是中国领土安全的主要风险之一。西藏和新疆问题也可能继续为西方国家和组织提供通过“人权”问题干涉中国内政的借口。我与周边国家的领土划界争端、尤其是海洋权益争端对中国主权和安全的影响将不断增大。此外，我国周边国家内部或其间的问题与冲突亦对我周边安全构成挑战。朝核问题及继承人问题仍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已经拥有核打击能力的印巴之间的对立存在升级可能性；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局势随时都可能有出现大动荡；缅甸军政府不稳定性增强。再有，中国周边也是民族分裂势力、恐怖主义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的聚集地带，从而使中国与世界、尤其是与伊斯兰国家的关系变得格外敏感。所有上述问题如果以极端的形式爆发，都将对我国的发展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二）发达国家会更积极地利用非中性国际规则制度化中国

鉴于自身实力的相对衰落和不断加深的国际相互依赖，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集团难以行之有效地通过传统“遏制”手段限制中国发展。为了避免中国利用不断上升的影响力去改变由其主导的国际秩序，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精英阶层将会更积极地通过国际规则来平衡或规范中国，即制度化中国。具体说，他们会努力诱使或胁迫中国更深入更广泛地融入由其塑造和执行的秩序体系，充分利用国际规则约束中国行为，限制中国权利的同时使我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由于国际规则或制度大都是非中性的，故我们接受规则，在某种意义上讲他们就赢了。尽管随着我国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能力和空间均获得了整体性的提高和扩大，但同时，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国际金融监管、气候变化谈判、劳工和技术标准及人权等领域，未来几年我国都面临着被西方发达国家制度化的风险。对此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三）西方舆论妖魔化中国的努力不会停止甚至可能变本加厉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中国模式”影响力的不断上升，西方国家对于中国在工业制造、国际贸易、金融体系、能源资源、气候环境、国内政策制定等领域的负面评论或舆论围攻，在未来几年内有变本加厉之势。这种通过舆论妖魔化中国的努力，类似于“有罪推定”（除非能够证明无辜否则所做一切均违法），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其一，由美国主导的各种国际问题研究，大多将中国描述为西方文明的潜在敌人或国际社会中的异端，并炮制出形形色色不利于我的理论或观念，如“中国威胁论”和“中国责任论”。

其二，大部分西方媒体利用各种时机贬损中国国际形象，以便将中国妖魔化。所有这些舆论片面夸大中国对世界的负面冲击，试图将经济失衡、原料价格上涨、环境气候等全球问题归咎于中国的发展模式和汇率等政策。如果这些舆论的负面影响得不到有效控制，我国发展势必受到严重掣肘。

(四) 我国发展面临的能源与资源瓶颈将长期存在

对外部能源与资源需求的迅速上升，将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中国发展受制于外部世界的“软肋”。在能源和资源领域，我国主要面临两类风险。其一是可获得风险，即我们能否在国际市场上买到并运回所需能源与原材料。其二是价格风险，即国际市场上能源与资源价格波动对需求国的影响。作为世界需求大国，尽管中国在国际能源与资源市场上的谈判地位不断上升，但考虑到能源资源国经济民族主义势力抬头、发达国家跨国公司阻挠、战略竞争性国家遏制、我国自身保护航道安全能力不足等现实，要彻底缓解我国目前面临的资源能源瓶颈问题，还需要我们付出艰苦的努力和等待一段时间。

(五) 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进入全面复苏仍面临一系列不确定因素

作为导致本次全球衰退起因的美国次贷危机及金融危机，目前已大体得到控制。受其波及和拖累的世界经济，也已经开始反弹并显露出各种复苏迹象。多数分析认为，世界经济将会在未来一两年内走出衰退实现复苏，随后可能经历一段中速增长期。但是，我们还必须看到，在未来一年或几年内，世界经济全面走上复苏和常规增长之路，至少还面对如下七个确定性。第一，现在的全球金融体系虽然大体稳定下来，但基础十分脆弱，引发危机的深层次问题几乎没有得到任何解决。第二，主要发达经济体应对金融危机政策实施空间正在接近极限，利率已达二战后最低水平，财政赤字都创造了二战以后的最高纪录。第三，发达经济体面临居高不下、甚至可能进一步提升的失业率。第四，在全球范围内加强金融监管所引起的融资成本上升，可能会阻碍投资增长。第五，弊端丛生的美元体系几年内难以根本改观的事实，再加上个主要经济体自利的经济政策，预示着世界各关键货币间的汇率波动幅度和频率加大加快。第六，以“碳关税”为代表的新型贸易保护主义对全球贸易与投资的负面影响尚难被全面评估。第七，绿色经济或新能源的前景还不十分明朗，它要成为引领全球进入周期性复苏和长期增长的新兴产业，还有许多条件需要满足。

(六) 我国在货币金融领域做出的任何政策调整均有可能触及金融安全

不管西方出于何种目的来谈论世界经济失衡和再平衡问题，这个问题还是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由此引出的人民币汇率问题，资本项目开放问题，以及与上述问题相关的国际国别金融体系调整问题和区域货币合作问题等等，均会在未来几年内变得日益紧迫，以至于我们不得不在上述某些问题上做出妥协、或继续抵御巨大的国际压力。一旦做出政策调整，诸如人民币汇率波动、投机资本大进大出、国内资产价格巨涨落、资本大量外逃、货币与财政独立性受侵害等问题都会不同程度地涌现出来。保持现有政策不变同样会带来不少问题，如大量热钱进入“赌”人民币升值，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难度加大等。此外，作为全球最大的官方外汇储备国和迅速成长的跨国投资国，我们持有的海外资产或权益，将会越来越敏感依赖与国际货币金融环境。所有上述问题，均需要我们认真权衡。

（七）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波折将影响我国市场安全

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内部受到经济危机冲击的各种势力开始积极游说本国政府，对中国部分产品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设置门槛。从目前及未来几年的趋势看，中国极可能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最大受害者。尽管贸易保护措施涉及金额占全球贸易的比例很小，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出口占GDP比重超过1/3、未来几年难以彻底摆脱对海外市场依赖的国家而言，不断升温的贸易保护主义及其所营造的国际经济交往的不良气氛，仍将使中国的市场安全全面临挑战。具体说来，由贸易保护主义引发的经济摩擦和对华贸易制裁，不仅涉及所谓的公平贸易条款，包括倾销、劳工、环保、知识产权和金融服务业开放等，还涉及汇率政策、技术标准、国际移民，甚至“动物权利”保护等等。在今后几年，伴随着气候变化问题的争执愈演愈烈，所谓“碳关税”等一系列新型保护主义政策，有可能成为发达国家针对中国商品出口和对外投资时越来越倚重的手段。

（八）中国仍有掉入“国际分工陷阱”的隐忧

在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还存在掉入“国际分工陷阱”的隐忧。长期以来，发达国家一方面力图让中国接受其技术和营销标准，另一方面对中国实施高新技术封锁，目的是保持其技术优势和垄断。如今，那些高技术含量、资本密集型的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基本仍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而中国参与的国际分工许多都处于国际分工链条的低端，其产品很多是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劳动密集型产品。尽管我国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需要有大量的国际分工低端产业以吸收农村富余劳动力，但长期看我们不能满足于这

种国际分工格局，因为一旦这种分工格局被锁定，中国受到来自其他发展经济体低端的激烈竞争倒在其次，更重要的是中国长期稳定快速发展会因此而受到威胁。

三、对策建议及中国在未来几年的全球战略构想

金融危机后世界形势发生的新变化新趋势，既给我国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总体而言，在“十二五”规划期间，中国所面临的机遇大于挑战。为了更好地把握机遇或挑战为机遇，我们提出如下政策建议和战略构想。

(一) 处理好坚持韬光养晦和积极有所作为的关系

在新的国际形势下，正确处理好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中国对外政策制定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和中国最大化利用战略机遇期的重要条件。考虑到中国至今仍旧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对世界的影响更多来自于数量与规模的扩大、中国正行进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建设和谐社会的道路上、外部世界特别是发达国家对中国发展疑虑重重，因而坚持韬光养晦理应在一段时期内继续成为我国对外政策的一个基点。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意识到，由于综合国力的迅速提升和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中国对世界事务的影响力以及与外部世界的利害关系也日益加重加深。在许多领域中国所享有的权利和赢得的尊重与其综合国力不成比例，而国际上又确实有些国家希望中国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或承担更多的责任。这一切都要求中国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在涉及我自身利益和人类共同利益的领域内更积极地有所作为。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两者的关系把握，以我国核心利益为基准。

(二) 力支持和充分利用 G20 多边框架以便积极参与制订国际规则

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是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在世界舞台上有所作为的必然选择。为了在国际秩序调整过程中抓住战略机遇，中国要由以往的国际规则的接受者或适应者身份向国际规则的建设者身份转换，通过在边际上改善现行国际规则来推进国际秩序朝着更合理的方向变化。鉴于 G20 正在成为当今和未来世界最重要的多边机制，更是鉴于中国在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极为独特的身份，因此我们需要全力支持和充分利用 G20 这一多边框

架，尽力将其打造成处理全球各类事务的超级平台，使它成为讨论和决定事关人类福祉之重大事项的主要场所，进而使其他国际机构逐步成为实践 20 国首脑所达成之共识或主张的工具。中国与其他主要经济体的双边和多边关系，亦应在 G20 框架内加以巩固或提升。

（三）进一步做实中美战略伙伴关系

美国是对中国发展具有全面影响的国家，因此巩固和发展中美关系是中国全球战略的最重要环节之一。在全球经济再平衡、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稳定、反恐、防止核扩散、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等诸多领域，中美两国之间有广泛而重要的一致与冲突的利益。在未来几年，美国仍将是国际秩序的最重要的支柱，仍将是中国重要的出口市场和直接投资来源地。同时在许多重大国际和地区事务上，美国也越来越需要中国的帮助和支持。本次金融危机的爆发更加使美国决策层意识到，美中关系将成为本世纪全球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在美国主导的全球制度体系遭遇重创的今天，中国应考虑有条件、有原则地给予美国必要的支持，延续并推动国际秩序朝着与我有利的方向改进。针对各种关于 G2 的议论，我们特别应注意要在 G20 的多边框架下做实中美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力求在政治制度、发展模式、意识形态各异的基础上，寻求两国利益契合点，扩大彼此在全球问题上的共识。

（四）在权利与责任对称的基础上承担更多国际责任

伴随着中华文明的复兴，国际社会对我国的期望值也在不断上升。为了赢得与我实力相称的国际地位、尤其是国际规则制定过程中的话语权，在权利与责任对称基础上承担一个大国应当承担的国际责任，理应成为中国应当认真做出的战略选择。具体说，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要根据自身的份额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遵守已经签署的国际条约，在特定情况下还要做出一定的牺牲，同时，对于发达国家在国际制度调整或创建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极端自利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要予以坚决抵制。尤为需要高度警惕的，是发达国家既得利益集团为中国等新兴大国设下的规则诱惑或陷阱。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我们始终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因为它有可能是被它们夸大了一个故事。再者，有美国智库最近提出，加大 SDR 储备货币作用、接受人民币成为 SDR 定值货币都是可以接受的，但同时要求中国全面开放资本项目并使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还要 IMF 建立一个专门账户来吸纳“多余美元”。这种看上去很有建设性的主张将会带来两个重要结果：中国在金融上完全暴露于外部世界；美国的主要债主从中国等国逐渐转换为 IMF。这样的结果恐